

湖北黄梅县张山遗址2025年考古发掘收获

张山遗址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杉木乡黄埌村的刘伏一墩，北依大别山，南距黄梅县城7千米。该遗址于1983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地区博物馆先后进行过调查和试掘，认为遗址包含旧石器与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由于成果未见公开报道，张山遗址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张山遗址所在的鄂东地区缺乏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考古工作，导致对这一地区更新世时期古人类技术、生存适应机制知之甚少。

2025年9月至2026年1月，为配合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黄冈市博物馆、黄梅县博物馆组建联合考古队，对张山遗址发掘600平方米，收获一批旧石器、商周时期的遗存，其中以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早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

张山遗址现状地形相对平坦，受地势影响整体略呈西低东高状态分布，地层有起伏。本次历史时期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平均发掘深度0.45~1.5米，共有5层，其中①层为现代表土层，②至⑤层为商周时期地层，遗迹在①层下至④层下均有发现。⑥至⑧层为旧石器时代地层，为网纹红土。旧石器时代遗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平均发掘深度1.9~3.05米。

旧石器时代遗存

⑥至⑧层均发现有石制品，各层石制品原料、剥片方法和修理技术较为一致，未见明显差异。石制品共计31件，类型有单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砸击石核、石片、使用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还有一些搬运砾石。原料以脉石英和石英岩为大宗，剥片方法包括硬锤直接打击法和砸击法，修理技术主要为单向加工。

既往鄂东地区旧石器考古集中在大冶石龙头在内的洞穴类型，张山遗址是本区域第一次对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发掘，揭露了该区域完整且连续的更新世网纹红土剖面。根据相关研究，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网纹红土形成年代在距今10万年以上，本次发掘提取了连续的地层



张山遗址出土石制品



G3出土陶器



H14出土陶器



张山遗址出土铜炼渣

光释光、粒度和磁化率样品，有望构建该区域更为精确的旧石器年代框架。

商周时期遗存

商周时期遗迹共发现灰坑24处、灰沟5条、房址3处、柱洞6处、烧土堆1处。房址集中分布在发掘区偏西北的两个探方内，也位于张山遗址台地偏西北，因破坏严重，发现时仅存少量柱洞、基槽；烧土堆分布于房址附近，东西向分布。灰坑、灰沟、柱洞分布无

发现

明显规律，灰沟东西向、南北向兼有。遗迹堆积大多不分层，结构简单。

张山遗址出土陶器共计70件，其中陶容器23件，器型包括鬲、罐、盆、钵、甗、三联杯，陶网坠37件，陶纺轮4件，陶拍3件，圆陶片2件，支垫1件；玉、石制品16件，包括石铤4件，石斧1件，石镞2件，石镰1件，石铲1件，玉环1件，磨石1件，其他石制品5件；铜炼渣3件。

商周时期遗存主要集中在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或可晚至洹北花园庄早期），属意生寺类型，典型单位有G3、G9、H14、H58。豆海锋、孙卓的研究表明意生寺类型的陶鬲有从瘦高到宽矮的演变趋势，据此可大致将张山遗址早商时期遗存分为两组，其中④层下开口的H14中出土两件高体鬲，年代较早。其余单位多开口于①至③层下，年代略晚。

初步认识

长期以来鄂东地区旧石器考古基础较为薄弱，张山遗址本次发掘实现了区域性重要突破，第一次完整揭示该区域更新世网纹红土地层堆积，出土系列原生埋藏石制品。该遗址石器工业隶属于砾石工业传统，原料偏好脉石英与石英岩，以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为主，文化特征和周边同期旧石器遗存具有明显共性，充分反映鄂东地区是史前古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传播的关键廊道。

意生寺类型遗存发现数量较少，张山遗址早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丰富了意生寺类型的材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鄂东地区商时期的文化序列。G3等单位所见的弧裆鬲、甗等器型也见于黄陂盘龙城遗址，显示出盘龙城类型与意生寺类型的密切关系。铜炼渣是本次发掘的重要发现，表明鄂东地区在早商时期可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金属冶炼活动，为探索早商时期的金属物料流通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黄冈市博物馆 黄梅县博物馆 执笔：李元初 高黄文 陶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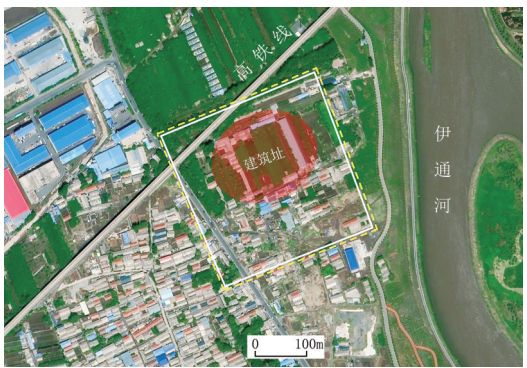
长春市宽城区小城子古城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的长度误入其中。通过观察拍摄于1970年的锁眼卫星照片，我们认为小城子古城应当还是一座方形城址，这也是分布于长春周边农安、德惠、九台等地的数十座辽金古城的最普遍平面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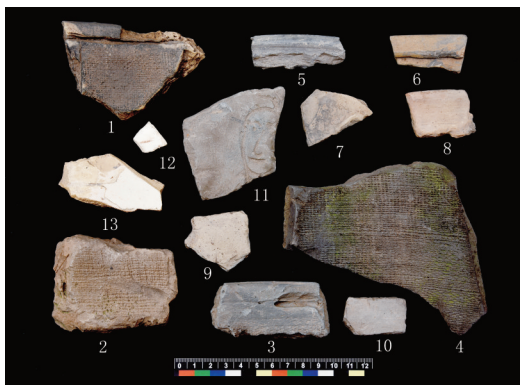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墙在1970年即已被水坝叠压。东墙的轮廓最为清晰，起止点明确。西墙、南墙虽然不够清晰，但仍然可以根据现代道路和院落的走势来推测墙体的“遗痕”。在小城子屯中部，有一道南北向与东墙平行的村路，其走向应与城墙有关，其东侧有一条深色阴影，可初步推测为西墙所在。小城子屯东南侧的南起第一排民居与第二排民居之间存在一道规整的空地，与北墙平行，这里应当是南墙的位置，此处还有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倾斜道路，很可能是连接古城的西门、南门而形成的。综上，根据城内现代道路、院落的走向，我们可以大体复原出城墙的平面形态（图一）：城址呈正方形，朝向东南，方向约156°，根据卫星影像测算，古城边长约325米，周长约1300米，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

城内北半部至今仍有大片耕地，我们对其进行了踏查，尽管未发现任何建筑台基，但整个城址的北半部的地表均发现有布纹瓦残片，以西北隅、东北隅两处最为密集，推测至少存在两组大型建筑。北城的中部地带瓦片稀少，从简报所附现场照片来看，1998年的发掘区很可能布设在此，因此除了灰坑之外并未发现房址。

城内地表除了大量的瓦砾之外，只发现极其零星的陶片、瓷片，选取四件典型标本介绍。刻划人物纹板瓦（CKX：1） 泥质灰陶，内施布纹，外阴刻人物纹，残存头部，圆目，长鼻，无发，头顶有两道斜出线条，整体似为行脚僧的形象，残长8.4厘米、残宽6.5厘米、厚1.5厘米（图二：11、图三）。布纹板瓦（CKX：2）



图一 宽城区小城子城墙轮廓复原示意图



图二 小城子古城采集陶、瓷、瓦件标本



图三 刻划人物纹板瓦及对比图像

图四 1998年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

位于长春市北郊、伊通河西岸的小城子古城是长春市区内仅有的一座古代城址。地铁八号线“小城子街站”即以此得名。民国《长春县志》记载：“小城子在县北三区十八里，因周围土壤隆然，仿佛昔年之城址，故名之曰小城子。耕于是者亦时获有古代之钱云。”另据口述史料，小城子屯始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从此荒废的山东移民，因见有古城废墟“其方圆约三百亩左右，内有房屋痕迹，四周有高土残垣，便以古城遗址称此屯为小城子。”

尽管小城子古城规模较小，但对于探讨长春早期城市史却尤为重要。李健才根据该城“呈长方形”的平面形态与相对距离，推定其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提到的“宽城子在厅北五十里，设废年无考”的宽城子古城。张博泉则进一步考证，将其定为金代的“斡母城”，即斡母谋克的治所（谋克相当于县），元代沿用为驿站。以上观点自1990年代提出之后逐渐被学界采纳，影响颇为深远。

相比历史地理方面的热烈讨论，对小城子古城的考古工作可谓寥寥无几。1987年出版的《长春市文物志》依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结果，对古城的平面、周长、遗物方面进行了简略介绍。199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古城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实际发掘面积354平方米，发现灰坑7个，出土了大量砖、瓦以及少量陶瓷残片、铁铤、铜钱等遗物。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再未见有针对该城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为了进一步明确小城子古城的平面形态、使用年代以及性质问题，2026年4月，对古城进行了细致踏查，根据本次调查所采集的陶瓷标本，结合历史卫星影像以及1998年的发掘材料，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小城子现属兰家镇管辖，城址东临伊通河、西临北亚泰大街、北临绕城高速，哈大高铁高架桥从古城西北角穿过。城址南半部被现代民居完全占据，北半部主要为耕地、林地和大棚。由于近、现代聚落的侵占和破坏，小城子城墙的保存状态极差，南城墙已被完全破坏，东墙北段在卫星影像中尚有残迹，但在地表上已经很难观察，西墙同样难以辨认。北墙因整体被叠压在现代水坝之下而得以保存，该水坝高约3米，呈东西走向，与伊通河垂直，现已废弃，水坝的中段有几处取土形成的纵向剖面，其内部堆积松软，未发现明确的城墙夯土，推测墙体应埋得更深处，尚未暴露。

关于古城的平面形态。《长春市文物志》中对城垣的描述如下：“古城平面呈长方形，据测量，该城东西长大约500米，南北宽大约250余米，现存城墙高1.5米左右，墙基宽10米左右。城门和城墙的附属设施已无法辨认。城墙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现在部分城墙和城内遗迹已不好辨认，尤其南墙的大部分已被压在农民住房之下，北墙也被压在土坝之下，现坝高达3米左右。墙外有宽10米左右的护城河一周，绕城向东流入伊通河，现已干涸。”1998年发表的《长春市奋进乡小城子古城发掘简报》则基本沿袭了前者的数据，认为“其东西宽500米，南北长约250米。古城址南墙、西墙被民房覆盖，无任何迹象，北墙为堤掩埋，东墙残存长30米，墙基残宽约10米，残高1.20米左右”。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发现，关于城墙的轮廓复原实际上存在矛盾之处，在北墙被水坝叠压、南墙被村落覆盖、西墙被民居破坏、东墙仅存残段的情况下，如何测得南、北城墙的长度？

实际上，在民国《长春县志》中，与小城子并列的库尔金堆、偏脸城等十座古城均言明其各自周长，且多精确到丈，唯独对小城子的周长语焉不详，可以推测，大体在民国时期，小城子城墙的整体轮廓即已不完整。20世纪80年代的“二普”调查对城墙的长、宽应为估测，尤其是北墙的数据，很可能是将部分水坝

颍河位于河南腹地，古称颍水，是古代“四渎八流”的“八流”之一。发源于嵩山南麓，流经登封、禹州、襄城、建安区、临颍、西华及周口市，至周口市西北沙河汇入处全长262千米，流域面积7348平方千米。为确定颍河中游干流两侧的遗址分布情况，全面掌握颍河中游遗址的基础信息，2020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许昌市襄城县、建安区开展了系统性考古调查。

调查区域

调查范围涵盖颍河干流两侧各10千米，包括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襄城县范湖乡、双庙乡、茨沟乡、颍阳镇、颍阳回族镇、汾陈镇、王洛镇、库庄镇等。本次调查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先秦时期的遗址，为开展该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

主要调查发现

通过此工作，基本摸清每处遗址的分布范围。共发现和复查先秦至汉唐遗址109处。从采集到的遗物来看，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商、东周、汉唐时期的遗存，尤以东周遗存最为丰富。

仰韶文化遗址 目前发现仰韶文化遗址较少，共9处。主要有台王遗址、洪村寺遗址、高庄遗址、刘堂遗址等。以台王遗址、高庄遗址为例介绍如下。

台王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范湖乡王村村西部岗地上，距颍河西岸约4.8千米。遗址被运粮河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相传曹操曾在此驻军练兵，当地百姓称之为“曹操练兵台”。本次调查对遗址及其周边进行了详细勘探，探明遗址周长6.2千米，总面积约1.65平方千米，包含台王村西部、东部、南部，以及刘桥村大部 and 城刘村西部。遗址中心为高台地，四周地势呈缓岗状，整体地势高于周边。根据钻探和遗址剖面可知：原遗址中心台地南部岗地文化层堆积3.5米，运粮河南部台地文化层堆积3.8米，遗址南部台地文化层堆积1.5米，城刘村西、北部堆积0.5~1.2米。地表采集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可辨器形有罐、豆、盆、孟、鼎足、鬲足、鬲袋足等，纹饰有篮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年代为仰韶、龙山和东周时期，其中仰韶文化主要位于遗址中心地带的高台地上。

高庄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颍阳镇高庄村西北约200米处，距颍河南岸约1.8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北部略高，平均海拔89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在一取土坑内发现较多陶片，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灰胎黑皮陶等，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可辨器形有罐、鼎足。剖面可见堆积厚度约0.9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年代为仰韶、东周时期。

龙山文化遗址 目前共发现26处。包括台王遗址、桓坡遗址、大路韩遗址、常庄遗址、台后桥遗址、贾庄遗址、新杨庄遗址、大路李遗址、南街遗址、后河庄遗址、小张庄遗址等。以桓坡遗址、小张庄遗址为例介绍如下。

桓坡遗址位于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桓坡村西北约900米，距颍河西岸约4.1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海拔75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在地表发现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可辨器形有罐、鬲、釜、罐、盆、孟等，纹饰有篮纹、方格纹、绳纹、瓦棱纹等。另有1处小型夯土台基，面积较小。剖面可见遗址堆积厚度约0.8~1.3米，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年代为龙山、东周时期。

小张庄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汾陈镇小张庄村东约300米处，距颍河西岸约7.7千米，地势中部高四周低，取土破坏严重，海拔90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地表散落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褐胎黑皮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等，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等，可辨器形有深腹罐、觚形器、盆、豆等。堆积厚度约0.8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年代为龙山文化时期。

二里头文化遗址 目前共发现7处。包括大路李遗址、槐树湾遗址、杨庄遗址、孙圪垯遗址等。以槐树湾遗址、孙圪垯遗址为例介绍如下。

槐树湾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汾陈镇槐树湾村南约170米处，距颍河西岸约4.4千米，地势较平坦，取土破坏严重，平均海拔96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或休耕田，地表散落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胎黑皮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等，纹饰有绳纹、可辨器形有深腹罐、高领罐、孟、釜、豆等。堆积厚度约0.8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年代为二里头、东周时期。

孙圪垯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范湖乡孙圪垯村西约100米，距颍河南岸约6.2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海拔76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地表发现大量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等，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等，可辨器形有罐。堆积厚度约1.5

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年代为二里头、东周时期。

商代遗址 目前共发现8处。包括新杨庄遗址、菅庄遗址、营孙遗址、谢庄遗址等。以菅庄遗址为例介绍如下。

菅庄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颍阳镇菅庄村西北约150米处，距颍河南岸约1.7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平均海拔94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在一取土坑坑壁上发现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灰胎黑皮陶，可辨器形有罐、鬲、豆、盆等，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等。剖面可见堆积厚度约0.7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年代为商、东周、汉代时期。

东周遗址 目前共发现69处。包括三刘遗址、台王遗址、桓坡遗址、城上村城址、西不羹城址、铁炉陈遗址、野陈遗址、槐庄遗址、庙上遗址、范湖遗址、大路韩遗址、杜庄遗址、周庄遗址等。以马庄遗址、野陈遗址、周庄遗址为例介绍如下。

马庄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颍阳镇马庄村东南颍河南岸，以及颍河桥东两侧。遗址系靠近颍河南岸，位于河岸南侧的台地上，平均海拔88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遗址北部被颍河冲毁，在河岸南侧屋壁上发现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可辨器型有鬲、釜、盆等，纹饰有绳纹、弦纹等。剖面可见堆积厚度约1.2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年代为东周、汉代时期。

野陈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范湖乡野陈村东北约300米，距颍河南岸约4.2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平均海拔80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在一台地周围发现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纹饰有绳纹，可辨器形有鬲、豆、孟、盆。堆积厚度0.6~0.7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年代为东周时期。

周庄遗址位于许昌市襄城县范湖乡周庄村东南约50米，距颍河西岸约7.3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平均海拔78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在地表发现较多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等，纹饰有绳纹、瓦棱纹，可辨器形有鬲、釜、豆、釜、盆等。剖面可见堆积厚度0.4~0.5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年代为东周时期。

汉唐宋遗址 目前共发现44处。包括草寺遗址、虎张遗址、南石遗址、柏家遗址、刘店遗址、小张庄遗址、赤涧傅遗址、晁庄遗址、前冀遗址、金刘遗址、管武遗址等。以晁庄遗址为例介绍如下。

晁庄遗址位于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晁庄村南约600米，距颍河西岸约1.7千米，地势整体较为平坦，平均海拔80米。调查时遗址为耕地。在该区域中心发现一处10×15米陶片集中区域，有炉渣、瓦当残片，推测为手工业作坊区。在地表发现较多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有部分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罐、盆、孟、板瓦等。堆积厚度约0.6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年代为东周、汉代时期。

初步认识

本次调查新发现遗址数量众多，基本摸清了该地区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先秦遗址的分布状况，丰富了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了解了各处先秦遗址的大致聚落规模，为研究该地区先秦时期的聚落分布及社会组织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结合以往的调查和研究成果，颍河中游先秦文化遗址具有以下特征：

史前时期，仰韶文化遗址规模较小，主要分布于山前地带，集中于颍河及其支流沿岸，这种分布特征反映了聚落居民对水源和土地资源的依赖。龙山文化阶段，颍河中游遗址数量众多，延续了仰韶文化时期遗址布局的特点，继续沿河分布，逐步向平原地带发展。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遗址规模差异较为明显，功能上开始出现分化，人口开始集中，逐渐孕育出王朝国家产生的基础。

夏商时期，遗址规模和数量与龙山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二里头文化时期，颍河中游遗址数量骤减，且多为新兴聚落而非龙山聚落的自然延续。遗址面积多为5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人口较少，这可能与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充实大型聚落存在关联，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型聚落的控制能力较强，控制半径得以扩展。商代沿用前期二里头文化遗址，群落在遗址数量和规模上变化不大。遗址两分布现象更加明显，如大路陈遗址、营孙遗址、孙圪垯遗址和谢庄遗址，时代均为二里岗上层时期，遗址间距为1.5~2千米。

东周时期，部分龙山至商代时期的旧有遗址得以重新使用，同时新建聚落大量涌现，呈爆发式增长。遗址间距离缩短，形成密集连续居住区，土地开发利用程度提高。聚落布局从商代的沿河节点分布转变为覆盖式的连续分布，中型聚落成为主体结构，大型聚落明显增多，与小型聚落构成连续等级体系。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王豪 杨严严）